

天朝礼治体系研究
(中卷)

东亚的礼义世界
中国封建王朝与朝鲜半岛
关系形态论

黄枝连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天朝礼治体系研究
(中卷)

东亚的礼义世界

中国封建王朝与朝鲜半岛
关系形态论

黄枝连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56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朝礼治体系研究 中卷: 东亚的礼义世界——中国封建王朝与朝鲜半岛关系形态论
/黄枝连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12

ISBN 7-300-02005-4/K·205

I. 天…

II. 黄…

III. 朝鲜-中世纪史

IV. K32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11935 号

天朝礼治体系研究 (中卷)

东亚的礼义世界

——中国封建王朝与朝鲜半岛关系形态论

黄枝连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39 号 邮编 100872)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张: 18.625 插页 6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476 000 册数: 1—2 500

定价: 16.50 元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

黄枝连教授，祖籍福建漳浦，1939年4月生于英属马来亚。1958年秋，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主修历史，副修哲学；1962年秋，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至哈佛大学深造，主修东亚近代史，副修社会学和政治学。

黄枝连教授于1964年秋返回香港，先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和联合书院，教授社会学、中国社会思想和西方社会思想等课程。1968年秋前往新加坡南洋大学（现被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东南亚华人史和东南亚文化史。期间，带领学生进行大量关于新马两地华族社会与历史的调查研究，撰写近三十份学术报告，对于当地的华人研究产生深远的作用。斯时，他还在《星洲日报》撰写社论。

1972年秋以来，黄枝连教授任教于香港浸会学院社会学系，担任过系主任；教授过大量社会学和未来学的课程。

黄枝连教授于1994年8月受聘为兰州大学“客座教授”；10月获得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颁发的“荣誉博士”证书。

黄枝连教授与香港的一些专业人士和企业界人士于1985年8月组织了香港亚太二十一学会，致力于推动关于亚洲—太平洋地区二十一世纪发展策略及其前景的专业交流协作的活动。已经赞助过《中华经济协作系统》、《亚洲西南大陆桥》、《亚欧大陆桥》等发展协作系统的大型国际研讨活动。

黄枝连教授年来以“跨越学科、跨越文化、跨越时空”的大取向，对中国和亚太地区走向二十一世纪的发展大计进行调查研究；并且撰写了大量有关的文章和专著。

内部需求满足对国际关系 形态确立的作用

——从朝中关系中探索“天朝礼治体系”的
理论与实践〔代序〕

黄枝连

本文大纲

前言：作者关于“国际关系形态研究”的来龙去脉

一、对于“天朝礼治体系”的调查研究

二、“天朝礼治体系”概念与理论的发展问题

三、“天朝礼治体系研究”的主题及其结构

四、“东亚礼义世界”的结构及其发展规律

五、对“天朝礼治体系”作为一种国际关系形态的结构分析

后语：《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从中卷到下卷的开张

前言：作者关于“国际关系形态研究”的来龙去脉

“天朝礼治体系”〔英文暂译为 Pax Sinica〕，是作者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继《美国 203 年：对“美国体系”的历史学与未来学的分析》之后，贯穿整个八十年代和延续到九十年代中的一项关于“国际关系形态”的研究和撰述计划。

作者是企图以跨学科的方法论和理论，对亚洲—太平洋地区

GDA92111

所存在过的“大不列颠式和平”，“大东亚共荣圈”以及“美式和平”……这样的区域性秩序架构进行一种突破性的探索；而在那个进程中，却“意外地”，“偶然地”〔或者说“必然地”〕发现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天朝礼治体系”；而不对它有所认识，对于东亚地区的历史发展规律及其动向，是不可能全面和深刻的掌握的。

这一切对区域性宏观秩序调查研究，从历史，到现实，及于未来，并且涉及各个层面和不同学科，便构成了作者所谓的“国际关系研究”。

一、对于“天朝礼治体系”的调查研究

从“美式文明”（The American System）、“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到“天朝礼治体系”的研究，反映的，也是一个学者在他的学习、读书、教学、研究过程必须经历的阶段。

原来，六十年代初期，作者在哈佛大学研究院深造时，在费正清教授（John K. Fairbank）指导下，东亚地区的文明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西方国家—西方文化挑战所作的反应（challenge & response），是主要的学习内容。

学业告一个段落，继香港中文大学有关中国社会思想和西洋社会思想的教学之后，作者前往新加坡南洋大学执教，带领学生从事新加坡华族历史调查研究时，及于日本的南进政策；对于所谓“大东亚共荣圈”（Pax Japonica）问题，便开始发生探讨的兴趣。1973—74年在东京亚细亚经济研究所和国立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及法政大学当“海外客座研究员”时，做的便是这方面的资料搜集工夫。

七十年代中叶，作者的研究和撰述，主要还是集中于日本的南进政策和“大东亚共荣圈”；并分析日本的南进政策和美国的西进政策冲突所导致的太平洋战争；而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

本在“美式和平”下的复兴及重建它对亚太地区的形态……

发展下来，以历史研究和哲学研究结合社会学的研究，终于产生了对“国际关系形态研究”的大课题，准备做它几十年；即，在于探讨“大不列颠式和平”（Pax Britainica）、“大东亚共荣圈”及“美式和平”……这样的同一个大国及一个重要的文化系统息息相关的国际宏观秩序及其规范之下区域格局，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共同特点与差异性；以便探索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区域秩序的结构——而在印支战争结束及中、美、日三大国及中国和亚太国家的关系正常化之后，令人们更感兴趣的，当然是走向二十一世纪亚太区域秩序的前景；特别是一个处于欣欣向荣状态的中国，它的定位问题，更耐人寻思。

既然如此，对于历史上存在着的以中国封建王朝为中心的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形态问题，便不能不成为探讨问题了——其实，研究日本的南进政策，是不能不及于它的北进政策，而研究美国的西进政策，亦不能不涉及它同日本在朝鲜半岛上的竞争，见之于它在日俄战争和谈中所扮演的暧昧角色。而一接触到朝鲜问题，中国同它的关系，也就成为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内容。而在哈佛大学的课堂上，费正清等教授亦对中国这个“天朝大国”及“中华帝国”对周边国家/地区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津津乐道及纵横议论，亦对作者的学问工夫发生了影响。

二、“天朝礼治体系”概念与理论的发展问题

这样的学习、教学及研究过程，历二十年之久，终于在我的读书研究中，产生了“天朝礼治体系研究”的部分。

自八十年代初叶以来，关于“天朝礼治体系”的研究，便成为作者的中心工作；其间，还于1984年和1986年的夏天，到过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活动；因为，朝鲜王朝的宫廷藏书（奎章阁）便是存放在那里。

其实，“天朝礼治体系”既然作为以中国封建王朝为中心，以礼仪为其主要形式的一种国际关系形态，它的覆盖面便不止朝鲜半岛。所以，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主要的问题是，用这么一个主导性的概念及由那里发展出来的一套理论与方法论，是否可以用来描述、概括及反映明清时代及更早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关系形态？或者说，它是否可以相当准确地概括西方殖民帝国主义国家及日本军国主义兴起之前，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的某种状态？

《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上卷《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涉及的，便是中国封建王朝与南洋（今东南亚地区）、西洋（今印度洋地区）以及东亚（今东北亚地区）的往来模式。书在1992年出版之后，作者便期待着各地的有关专家学者对它的评论。

1994年7月8日，终于得到这么一个宝贵的机会。

那是作者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之邀，访问北京期间，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编辑部（周文柏、孟超、刘仰东等君）的安排之下，由人大校长、历史学家李文海教授，历史系毛佩琦、黄爱平，哲学系张立文以及经济系方生等教授参加的一次座谈会上，就上卷的理论与方法论，大家集中地进行探讨。

对于作者来说，结论是很有鼓舞价值的。即，人大的有关专家学者认为，“天朝礼治体系”这么一个概念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1900年以前亚太地区所存在过的国际关系形态；亦即是，它相当准确地描述并概括了明清及那之前中国封建王朝同周边国家/地区关系的状态。

这一来，使作者有更大的信心，把《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中、下卷的整理与出版工作进行下去（原来是计划以一卷了结它；现在发现，分成两卷比较合理）。

三、《天朝礼治体系研究》的主题及其结构

那么，“天朝礼治体系”以及《天朝礼治体系研究》的内容又是些什么？

可以这么说，它主要是在于探讨华夏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儒学—儒道—儒术次文化，如何成为一个塑造社会情境结构的体系？即，当人们在不同时间、空间、场合同周围的人物发生交流协作的状态里，它如何对其生理—心理—群理活动加以规范，并进而指导人和自然—超自然关系的开展（物理—天理系统）……

如果统称这个文化组合为“礼治主义”（或“礼治体系”），那么它便是中华传统为人类文明所提供的一种生存发展之道；它既是一种理论，又是一种运作模式。

《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上卷里收集了六篇论文；其主题是在探索北魏孝文帝和朝鲜王朝等两个统治集团如何根据其内部社会发展的需要，主动地引进儒学—儒术及有关的礼治主义来对它们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情境结构进行改革，从而建立一个高度儒化的社会体制和统治方式以及生活方式——就叫它做“礼义世界”。

与此同时，本书也指出了，琉球王朝虽然同中国的封建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内部社会文化生活的儒化程度却是很不可观的；至于郑和下西洋所经过的南洋和西洋，也没有使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因此进入（或引入）礼治主义的。而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是另一个型态；即，一方面，它引进了中华传统及其礼治主义的某些部分，另一方面，却以倭寇骚扰和丰臣秀吉侵略的方式对“天朝礼治体系”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因此，《天朝礼治体系研究》的中卷，《东亚的礼义世界：中国封建王朝与朝鲜半岛关系形态论》，便用了十四世纪晚年和十五世纪初年高丽王朝和刚刚建立的明王朝的关系，以及继高丽王朝而起的朝鲜王朝和明王朝的关系，作为个案，来分析礼治主义体系对于一个国家/地区内部社会发展的规范性作用，及对于它的外

事活动和处理同邻国关系（特别是对中国关系）上的指导性作用。

四、“东亚礼义世界”的结构及其发展规律

本书是由四个章节组成的。

第一章《礼治主义在朝鲜半岛的建立和“天朝礼治体系”的开张：“天朝礼治体系”形成的内因、外因及其曲折过程之探索》，在于探讨长达二千年的半岛内部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及它同中国大陆的封建王朝在双边关系开拓上的曲折过程。

显然地，朝鲜半岛原来是一个游猎民族活动的大舞台。根据现代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论来看，是文明发展的初步阶段。在中国的两汉时代，开始形成夫余、高句丽、马韩以及百济这么几个集团，其社会组织在规模上和程度上，都日趋庞杂；更重要的是从女性中心变成男性中心的父权社会。只有到达了这么一个阶段，那里才出现内部的需要和动力，主动地从中国大陆输入汉族文化，以塑造其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

人们还可以看到是，半岛上，作为以国家形式出现的严密的、大规模的政治组织，是在隋唐时代的高丽、百济及新罗。它们之间的混战，以及高丽和中国发生的许多边境战争，都可以说是这些新兴政治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发生的一种历史现象。

另一方面，在中国方面，隋代和唐代初年，中国封建王朝多有“东征”之举，同半岛方面发生严重的武装冲突；亦反映出，中国的国家及其国土的发展过程仍未完成；因此，表现在它大陆和半岛的国境线处于流动状态。

双方在连场的、连年的冲突中，终于总结出了历史经验：不介入对方的内部纷争（内战），并且在边境上维持和平，是符合彼此基本的、现实的以及长远的利益的——于是，在唐代中叶以后，在半岛上称雄的高丽人，开始接受中国人的大国地位以及其权威，确立其“事大以礼”的关系形态；使得“天朝礼治体系”终于能

逐渐地形成。

不过，作为国际宏观秩序的一种模式，“天朝礼治体系”的成长也是经历一个很曲折的过程的。这见于高丽王朝统一半岛之后，同中国大陆的契丹、金、南北宋等王朝的关系还是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而蒙古人在中国建立元王朝之后，由于他们的黩武主义，对半岛进行直接的军事统治，并胁迫高丽人为其侵略日本的政策服务。亦可以说，是一种不合乎礼义的行为。

所以，本书第二章，《明太祖对“天朝礼治体系”理论与实践上的发展》，便在于探讨明太祖在处理高丽王朝及代之而起的朝鲜王朝的关系上，对于“天朝礼治体系”的开展，在理论上与实践上所发生的影响；显然地，在蒙古人的倭佛活动影响之下，“非礼”的事件层出不穷；再加上明太祖与李太祖两位开国人物的性格有水火不相容之势，始终使得双方的关系格格不入，难以纳入礼尚往来，互相尊重的轨道的。

一直到明成祖和朝鲜太宗国王时代，出于两个人的特殊背景及需要，和两国利益的一般考虑，两国关系才得以在“天朝礼治体系”的架构之下，逐步地开展；使李朝在它立国的四五百年里，始终“以诚事大”，并且成为“礼义之邦”——这便是本书第三章《在“天朝礼治体系”之下顺利发展的明王朝与朝鲜王朝的关系》。

这里，要进而指出的是：在“天朝礼治体系”之下，中国和朝鲜的贸易不发达，是有其重要的结构性因素。

显然地，建立在自足自给的小农经济之上的礼治体系，商品经济无从建立，便是不需要在境内和境外开展贸易活动。在没有国内市场的情况下，海外贸易也变成是多余；而所谓“天使贸易”和“贡使贸易”，既然不能同既有的农业和手工业活动发生有机的联系，当然也就很难发达起来的。

因此，对于日本人来说，这样的国际关系形态，就更加没有价值可言了——在一个意义上，倭寇是一种掠夺式的海上贸易活

动（其实，近代史上西方国家对亚非等地进行的，还不是近似的活动吗？）。

严格地说，日本不是“天朝礼治体系”的成员；因此，“体系”对于日本是没有约束的能力，而日本是不必尊重它并接受它的规范；比诸朝鲜人、暹罗人、琉球人和安南人，日本人是有一定的主动权——包括对邻国发动武装袭击的“自由”。在一个意义上，日本人便是“化外之民”。

第四章《日本在东亚礼义世界的进出：“天朝礼治体系”下，明王朝和朝鲜王朝对“壬辰倭乱”的处理》便指出，丰臣秀吉的侵略行动在于征服半岛和大陆以及于亚洲其他地区，以便建立另一种国际关系形态。因此，明廷之所以能坚决地排除朝鲜人“引倭犯辽”的谣言和顾虑，不惜代价，兴师动众，予以支援；固然涉及中国自己的国家安全，更由于朝鲜建国以来，“血心事上，尽礼尽诚；律用大明律，历用大统历；服色礼义，无不慕尚（中华）”。

在这个意义上，朝鲜人和中国人是为维护“天朝礼治体系”而进行的一场重要的卫道战争；以免“环东土数千里，沦于禽兽之区”。

另一方面，丰臣秀吉集团之所以拒绝明王朝对他的“封贡”，不愿就任所谓“日本国王”，亦由于日本人不像朝鲜人，根本不希罕什么中国人的“册封”呢——两百七八十年之后，即“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终于以强大力量完成丰臣秀吉的遗志，在摧毁了“天朝礼治体系”后，也把朝鲜王朝灭掉了；使半岛沦为它的殖民地；并且从那里开始，着手建立它的“大东亚共荣圈”呢。

五、对“天朝礼治体系”作为一种国际关系形态的结构分析

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天朝礼治体系”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的形态，可以理解为一个社会巨系统，或者说，一种文明体

系；是有它的复杂的结构的及发展和兴衰过程的。

其一，它是建立在以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家族制度为主体性的社会制度，强调的是父兄和家长的权威；发展而为女子对男子，子弟对父兄的从属的关系。由于排斥商品交易活动，整个社会缺少流动性。在各自岗位上，恪守本份，安土重迁；做自己应做的事，说自己应说的话，想自己应该想的事，即是合乎礼义。而且，亦有一整套用于确立这种从属关系的礼仪，即所谓“礼治主义”。

这个原则，可用于指导一个社会的内部建设；亦可扩大及于它对外事活动的追求和规范之上。

因此，一个国家及其社会对礼治主义的接受的可能性及其程度，在于它的产业结构和活动上的发展状态、发展阶段以及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朝鲜半岛从三国时代经新罗称雄时代和高丽王朝时代，最后及于朝鲜王朝，前后两千多年，可以说，根据其内部发展的需要，对中华传统及其儒学—儒术次文化的引进，亦有一个漫长和曲折的抉择过程。

其二，一个国家在外交活动上所依循的宏观取向和宏观架构，是根基于它的社会发展模式。换句话说，它所支持的某一种国际关系形态，是在为其内部社会发展，稳定其内部的社会情境结构而制造有利的外因。

可以说，“内需”和“外需”，是所谓“国家需求”这个“铜板”的两个不同方面呢。

这么一来，便可以理解，朝鲜半岛同中国封建王朝的关系，为什么也要经过那么长的一段时间，才在十五世纪初年，稳定地进入“天朝礼治体系”的大框架之内。

其三，任何一个国际关系形态，显然地，是同一个大国和它所代表的一个文明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这个大国，以其政治、经济、军事及其文化上的优势，对区

域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无可否认地，具有一定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的境外影响，往往是一种覆盖性的现象。这种优势地位的取得，可以是这个大国积极地向外扩张其力量的结果；亦可以是周边国家/地区，出于其内部需要的考虑，对它的优势主动地加以肯定与接受的结果；或者是两种活动交叉作用的结果。

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国际政治而言，美国人相信必须把美式文明及其美式民主移植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因为，任何接受这个发展模式及情境结构的国家，便不会是对美国利益进行挑战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多了，以“美国体系”为中心的世界才会有太平的——而与此同时，中国人却针锋相对，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认为必须建立那么一种国际秩序，允许不同的国家，可以根据其国情和内部需要来决定其社会制度；亦即其社会情境结构和应境硬件—软件系统。

至于“天朝礼治体系”，对中国的封建王朝来说，也不是被普遍地接受的。

首先，它也有一个成长过程；一直到唐代中叶才臻于成熟。见之于不再介入半岛的内争及干涉其政。不过，由于南北宋时代中国的分裂，没有能很好地推行。到了元朝时代，由于蒙古人的黩武主义和佞佛活动，也可以说，使它受到严重的扭曲。中国人亦必须认识到，“天朝礼治体系”也是在于满足其“国家需要”的。

这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于中国人来说，“天朝礼治体系”在外事活动上的指导作用及程度，也同它的封建王朝对儒学—儒术—礼治主义的接受程度有关。因此，一个迷信武力在外事活动上的作用并明显地排斥儒学—儒术的政权，是不适宜（亦不会）对它有所承担的（见之于契丹人的辽王朝和蒙古人的元王朝）。

这里，反映出，“天朝礼治体系”的意识形态，是同汉族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儒学—儒道—儒术—礼治的次文化是有着密切关系；在朝鲜王朝中叶以后，还局限到“朱子学”那么一条线上。显

然地，佛学—佛教这个化夏文化中的另一个次文化，对于“天朝礼治体系”的确立与开张，是不是没有什么大作用可言？或者，只是起着具有破坏性的作用？……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其四，这个区域性的国际关系形态，必须是对地区内众多国家之间双边的以及三边的、多边的关系能发生一定的规范性作用的。

在这方面，近代和当代史上的“大不列颠式和平”和“美式和平”是表现无遗；而在“天朝礼治体系”上，其作用不是很显；主要见之于有关国家/地区对中国的双边关系上。因此，“壬辰倭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个案；因为，它反映的是，一个不接受区域秩序的国家（日本），不但对“体系”之下的一个重要国家（朝鲜）发动直接的武力攻击，而且还把矛头直接地指着代表这个“体系”的大龙头（中国）呢。

明神宗（万历皇帝）对朝鲜王朝的全力支援，可以理解为是确立这么一个重要原则所需要做出的巨大努力（或者说是昂贵的政治代价）：一个区域性的宏观秩序及其格局，是必须受到第三国的尊重（如果不能取得它的接受与支持的话）；而一旦发生什么“不尊重”的事件，“天朝”及有关“藩邦”不能做出纠正，那么，它的存在价值便立即发生动摇以致于土崩瓦解的——当“天朝礼治体系”抵挡不了日本人在十九世纪末叶的攻击，保护不了朝鲜人而使他们受到日本人第二次的侵略时，可以说，它的存在的合理性（至少在中国与半岛的关系上来说），已经是不存在了。

因此，一个国际宏观秩序，不但是要有一定的军事力量来支撑它，还要有一个完整的形而上和形而下的架构——即，有其理念、机制、形式，还必须是能发挥其功用；即，有其效益性的。

后语：《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从中卷到下卷的开张

不过，在日本人的两次挑战之间，“天朝礼治体系”还是有其合理性的。

那就是，在朝鲜王朝和满清王朝的关系上，它还是提供了那么一个框架和某些行为规范，使得朝鲜半岛上最后一个王朝，和中国大陆上的最后一个王朝，在被近代殖民帝国主义浪潮所吞没之前，还是能和平共处、满足需求的。

换句话说，从十七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有两百年那么长的时间，“天朝礼治体系”是为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的内外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宏观条件；为朝鲜人对其“五理系统”的处理，以及这个“处理”所依附的社会情境结构—架构和应境的硬件—软件系统，提供了足够的理论与方法论。

可以说，也是它作为一个跨越地区，跨越民族，跨越时代的文明系统的最后一个生命历程——无可否认地，还是一个比较光辉灿烂的时期吧。

这就是《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下卷《朝鲜的儒化情境结构：朝鲜王朝与满清王朝的关系形态论》的主题所在之处。

〔1994年9月25日初稿，11月13日修订于香港〕